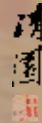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学术通讯

Newslette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No. 3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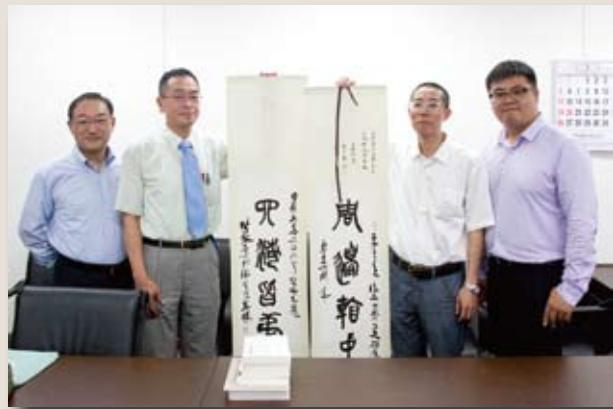
总第三十五期



2015年9月7日，我院召开“《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暨《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新书发布会”。本次新书发布会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朱莉丽主持，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教授、文科科研处葛洪波副处长、亚洲研究中心金光耀主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王德耀董事长分别在会上致辞。葛兆光教授发布并介绍了《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日本驹泽大学小川隆教授等5位学者介绍并发布了《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



2015年7月21日至8月8日，为配合文史研究院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编著的《支那文化史迹》的项目，我院李星明研究员利用暑期，沿着常盘大定和关野贞20世纪早期的踏查足迹，到河南开封、洛阳和登封以及陕西西安考察北朝、隋唐、宋辽时期的相关遗迹和文物的现存状况，并核查出该套图集中的某些讹误。



2015年7月5日至8月15日，我院许全胜副研究员及王鑫磊助理研究员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为期40天的学术访问，并分别作了题为《说蜜》及《东亚视野下对1592年朝鲜战争的思考》的学术报告。

目 录

第五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纪要	2
复旦文史讲堂(第九十三至九十五场)	
现代台湾寺庙建筑的新样貌 / □颜娟英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7
关于日本的禅宗研究 / □小川隆 驹泽大学综合教育研究部教授	10
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趋向 / □黄进兴、李孝悌、葛兆光	12
《朝鲜通信史文献选编》暨《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新书发布会纪要	15
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踏查记之二 / □ 李星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	18
对马岛探访记 / □ 王鑫磊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2
从“四夷”到“外国”：《宋史·外国传》研究 / □ 钱云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	25
新书介绍	27
外刊撷英	29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2016 年“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博士、硕士招生简章	33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活动预告	36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15.07—2015.09)	38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第五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纪要

2015年6月24日至7月3日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了第五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研修班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作开设,旨在促进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领域中外学生的交流与培养。研修班的授课由六位不同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担任,分别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柯马丁教授(Martin Kern)、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颜娟英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艾尔曼教授(Benjamin Elman)、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大木康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院的川原秀成教授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的王国斌教授。他们为学员们带来了多彩的思想盛宴。此外,文史研究院董少新、张佳、王鑫磊三位老师作为课程主持全程参与,为学员的学习、生活提供全面帮助。

来自世界各地高等学府的40位学员参加了此次研修班,人数为历届最多。他们主要来自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海德堡大学、苏黎世大学等欧美高校;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首尔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等亚洲名校以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沪上高校。学员们的专业领域互有参差,涵盖了宗教、艺

术、文学与历史研究,在此次研修班中另有政治学专业的学员参加。



6月24日下午四时举行了研修班开班仪式及师生见面会。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教授首先做了开班致辞,对参加本次研修班的学员表示欢迎,对过去四届研修班的成功举办和良好效果充分肯定,强调暑期研修班对高校间学生互相交流学习意义重大。随后,艾尔曼教授、颜娟英教授、李星明研究员也分别致辞。艾尔曼教授说这是他第五次参加研修班了,但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和感动,看到本次研修班人数这么多,大家的专业分布如此广泛,学习热情如此高涨,相信今年的研修班会有新的突破。颜娟英教授则与大



家分享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以研究道路上一个个的机缘巧合来讲述种种艰辛与无尽乐趣，鼓励大家在自己认定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把生活中的不确定当作生命中的惊喜和礼物来看待，这些巧合最终会形塑一个更好的自己。李星明老师代表本次研修班的举办机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再次欢迎了大家的到来，带大家回忆了过去四届研修班的举办情况，指出“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研修班一直秉承严谨的研究态度与国际化的研究视野，也逐步在国内外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和影响力。希望学员们在这种不同专业、不同学校、不同文化传统的背景下，突破专业、国籍、文化的限制，互相开拓视野、启发思维。李老师也提到，目前的学员组成以国外居多，国内主要限制在复旦及其他上海高校，而上海以外的国内高校学生则没有机会，今后希望突破这个限定，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参与研修班。接着，复旦大学图书馆廖剑岚老师为大家详细介绍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情况、数据库建设，并且对与文史研究密切相关的数据库做了针对性讲解，解答了大家关于资料检索、文献整理等方面的问题，鼓励大家充分使用复旦的数据库资源。最后，董少新研究员为学员们详细介绍了本次研修班的安排。他一方面对学员的学习提出了严格要求，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为大家介绍了复旦周边的各项实用生活信息。



此次研修班的课程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东亚知识与艺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柯马丁教授讲授“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作者问题”，他认为早期文本的作者可能是后人添加的，这其实是作为知识的文本被重塑的过程。一般我们都会认为孔子是《春秋》的作者，但柯马丁教授对此提出了质疑。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有两种提到了“孔子作《春秋》”，一个是《孟子》，一个是《公羊传》，但这两处证据都并不可靠。那么《春秋》的作者被汉人认定为是孔子又是从何而来？柯马丁教授认为，这里面的关键人物是司马迁。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从各个方面强调孔子和《春秋》的关系，其中最著名

的是《太史公自序》中那段关于圣贤遭遇困苦之后而有所作为的论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柯马丁教授认为司马迁对孔子的“作者”身份进行了“创造”。柯马丁教授认为孔子和《春秋》是有关系的，但不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在先秦时代没有人说孔子编史，孔子是作为最敏感的读者和阐释家存在的，经过司马迁有意的塑造，孔子的“作者”身份在汉代被接受。司马迁或许不是塑造孔子“作春秋”的最初起源，但肯定是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司马迁是出于何种目的来进行这样的“创造”呢？在《史记》中只有屈原和孔子得到了司马迁“想见其为人”的待遇，柯马丁教授认为他们三人都是悲剧式的英雄。司马迁极力把孔子塑造成等待了解与承认的作者，并且说“等待的那个人就是我”。在这样的过程中，司马迁也通过《史记》“创造”了他自己——英雄圣人式的角色。之后柯马丁教授又以屈原为例对早期文本的作者问题进行了探讨。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颜娟英研究员的授课题目是“初唐佛教艺术图像学”，主要讨论了南北朝至初唐时期佛教艺

术中“涅槃图像”的演变的进程，其中涉及到佛教中国化、文本与图像的交互等重要问题。颜老师首先提到了在研究佛教艺术时要面对的四个挑战：第一个是佛教艺术从印度、中亚传到中国时会发生变化；第二个是佛教艺术作为公共艺术并未受到士人重视；第三个是在佛教艺术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自上至下的影响，也有横向的传递，甚至地方也可能影响中央；第四个是图像和文本之间关系复杂。随后进入到对“涅槃图”的讨论，释迦牟尼平生有四个最重要的事迹：诞生、成道、说法和涅槃。在中亚，犍陀罗开始依照佛传故事，用图像来表现现实中释迦的死亡过程，涅槃由此成为具体事件与叙述性图像。佛教艺术传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在北魏早期的佛传图像里面有生无死——有佛的诞生但没有佛死亡的图像。另外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佛佛相续，强调佛的诞生是很祥瑞

的事情,比如在汉译佛经中会记载佛祖诞生的时候会有“黄羊生黄羔,白马生白驹”,在佛教造像的图像上也有这样的表现。北魏后期在造像图像中出现了涅槃图,颜娟英教授以云冈石窟第11窟西壁涅槃图为例进行了说明,这里的图像刻画很生硬,但这是石窟中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涅槃图。到六世纪中期,涅槃图图像本身发生了一些变化,气氛变得非常严肃,构图变得规矩,这可以在藏于芝加哥艺术馆的西魏造像碑上看到。隋代修造的敦煌石窟第420窟窟顶壁画中也出现了涅槃图,这里的涅槃图,变得非常轻松,释迦佛不是很僵直的样子,身体形态很自然,与之前看到的不同。在唐代初期,涅槃图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等到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七世纪末八世纪初,样子也变得和之前很不一样,这是因为在唐代涅槃图有了新的发展,不再和法华经结合在一起或者和弥勒结合在一起。在7世纪末的敦煌石窟第332窟南壁的涅槃经变中有佛祖坐在棺盖上为他的母亲摩耶夫人说法的图像,这一情节并不在《涅槃经》中,而是出现《摩诃摩耶经》中,这是武则天时期才流行的经典。



第二个主题是“晚明文化与文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教授以“晚明科举策论:它们告诉我们什么?”为题带学员们一起释读晚明科举中的应试文章,讨论这些文章究竟可以告诉我们什么。科举制度是形塑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在政府、社会和文化方面扮演着决定性角色,为提供儒家学说、文人声望、国家权力和文化习俗发挥了重要作用。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陀罗仪”上,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500年,直到20世纪才倒下。明清时代的科举不能与教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践形式相分离,这是较为恰当的评价。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要求士人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由此形成了一种考试专用的文体,通称“制义”,这种文体还有很多其他称呼,比如制艺、经义、时文、史艺等,大家最熟悉的名称是“八股文”,这

是从制义的结构和写法的角度来命名的,也有人称其为“四书文”,这是因为明清科举考试题目取自《四书》,要求考生用八股文的形式来阐发《四书》包含的义理。一般人都认为八股文不过是科举时代士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说的都是装腔作势的门面话和套话,但其实在古代,儒学是身心性命之学,制义是提高学养的一种工具,而且科举考试的题目本身是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密切联系的。艾尔曼教授选了《钦定四书文》中的几篇文章作为例子进行介绍,《钦定四书文》是清朝乾隆初年钦定颁行的,为士人提供“制科之标准”的科举用书,由方苞编订,选录了明代的制义486篇,清初的制义297篇。“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王鏊)、“民为贵”(艾南)两篇应试文章其实都是明朝当时社会和政治心态的反映。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教授的授课题目为“晚明的出版与文学”,晚明出版业兴盛使得市场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显得越发紧密,白话小说迎来了成熟时期,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一是精神背景,二是物质背景。在精神方面,过去的文人基本上看不起民间文学作品,但到了晚明,一部分文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比如像冯梦龙这样的文人就很看重民间作品的价值,积极参与这类作品的出版。冯梦龙很关注俗文学,他曾经收集了很多民间歌谣,编成了《山歌》一书,在序言中提到“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肯定了俗文学的价值。《山歌》是被刊刻出版的,这就涉及到受众与市场的问题,明末出版业的发达为这类文学的成熟提供了条件。南宋、元代在书籍内容的多元化和书的普及方面有所发展,但到了明代,明前期出版业的发展似有停顿,当时出了不少书,但就内容而言大多是所谓的古典,并无新意。嘉靖以后,江南地区的出版业呈现出空前的盛况,出版业的发达,是白话小说在晚明繁盛的重要背景之一。宋代只有古典的作品被刊刻出版,到了明末,因为技术的发展,出书的费用比以前更低廉,读者的需求也比以前扩大,他们在阅读经书、诗歌这些古典之外,也有阅读通

俗小说、戏曲作品的需求。随着这样的变化,当时知识分子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出版文化人”,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冯梦龙,他编的科举参考书很受欢迎,还出版不少通俗文学,包括戏曲、歌谣、小说等。



第三个主题是“西学东渐与东亚回应”。东京大学文学院川原秀城教授作了题为“中国西学和朝鲜实学”的主题演讲,从科技史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待晚明以来的西学东渐潮流,西学的影响不单单停留在技术上,而是深入到思维模式的层面。在明代晚期,向中国传播西学的主要传教士,他们采用神学加哲学的传教方式。当时的哲学概念和现在不同,包括逻辑学、物理学、数学等,因此他们运用当时西学中优于中国的技术来吸引听众并随之将其发展为信众,很多传教士具有高超的医学和历法知识。当时有一种观念是西教应该被禁止但西学是必须的。西学传入后给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带来很大的改变,一是“天观”的变化,二是“地观”的变化,三是“人观”的变化,由“心主之”学说转向“脑主之”的学说。戴震就是西学与经学交汇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清代的考据学就是受到西学影响的结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于论证的重视;二是将天文历算从术数一类中分离出来;三是“经”至上主义;四是学术教育的阶段化。之后川原教授又介绍了朝鲜的实学。从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朝鲜社会在经历了两次战祸之后,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怀疑朱子学的绝对权威和现实有效性,这些怀疑让他们倾向于实学、阳明学、西学等思潮。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王国斌教授的授课题目是“在新旧与中西之间晚清的政治经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讨论,细致分析中西间的不同,但强调不应该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中心来看待这段历史。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往往认为:在欧洲历史中形成了一些关键做法,这些关键做法的流传则创生了近现代的时代特征,但如果以这些特征来审视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则可能发生偏差。

欧洲的政教分离在近代早期已经完成,并且在近现代被提倡为一种国家塑造的全球性原则,但中国历史中宗教和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如果用“世俗——宗教”这样的区分来看待的话,将无法获得一贯的理解,中国没有这样的二元对立,社会中各个方面力量都很活跃。国家在社会的宗教活动中施加意志的程度是受到限制的,但国家依然有在定义合法的、适当的宗教活动上扮演裁决者的意图,这也是国家和社会群体非竞争性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示。在财政上,近代早期中国的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征税和支出的影响不同于欧洲,中国从14到19世纪中叶一直高度依赖土地税和劳动税,商税只是偶一为之。中国的经济政策促使了最佳的农耕和工艺生产技术广为流传,有助于运输体系和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系,为帝国境内带来普遍和平,使得贸易障碍比当时欧洲更少。王教授指出,聚焦于比较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会加深我们对于多元分殊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历史可能有的面貌。



六位学者的授课各具特色,但都非常深刻、生动,每次课程中都会有老师与学员间热烈的讨论,提出新的视角或者将某个问题更深入地展开。课程的三个主题围绕跨区域与跨学科研究两个大方向展开,这是“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一直以来所提倡的,也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所极力推动的研究方向。



在课程之外,研修班还安排了三次实地考察,其内容与课程精心配合。6月26日,在董少新老师的带领下,艾尔曼、颜娟英两位老师和学员一起参观了上海博物馆,受到上海博物馆杨志刚馆长的亲自欢迎。上午由青铜部葛亮研究员为学员们详细介绍了上博楚简的情况,出土文献能够给早期中国研究带来怎样的契机,这正好和柯马丁老师所讲的早期中国文本的作者问题密切联系。下午学员们参观了雕塑馆,馆内陈列展示了很多南北朝与唐代的佛教造像,与颜老师的课程内容可以印证。6月28日的考察地点是嘉定博物馆、孔庙与古漪园,本次考察由张佳老师组织,艾尔曼、大木康、川原秀城、王国斌几位教授与学员一起参加了本次考察。嘉定博物馆创建于1959年,占地面积1.3万余平方米,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已成为一个拥有文物3000多件,陈列面积3000平方米的地志性博物馆,并承担着全区包括南翔五代砖明代秋霞圃等四十余处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工作。参观完嘉定博物馆后,一行人又前往孔庙考察。孔庙中现设有科举博物馆,学员们借此得以了解了古代科举的各方面情况,可以和艾尔曼老师的课程相互印证。最后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参观古漪园,此时正逢大雨,园中遍植荷花,在

亭台楼阁中看荷听雨是考察过程中最闲情的一笔。6月30日,学员们在王鑫磊老师的带领下实地考察了徐家汇藏书楼、天主教堂、光启公园以及土山湾博物馆。徐光启是明末倡导西学的重要人物,对于和他相关的遗存的考察使学员们对那一段历史有了更深的体会。在参观徐家汇藏书楼的时候,学员们有幸进入平时不对外开放的藏书楼书库,大家无不被百年前典雅的设计和神秘的氛围所感染。



在研修班的最后一天上午,学员被分成三组,在组内各自展示了自己的课程报告,学员间讨论不断,气氛热烈。下午学员们畅谈了对本次研修班的感想与建议,学员们都认为研修班为大家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今年的研修班已经是第五届了,在推动青年学生的交流和培养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五年的坚持展示的是三校推动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的诚意和决心。在未来,研修班将以更合理的课程、更完善的细节、更自由的氛围来推动这一事业,期待更多优秀学生的参与。

(吴洪斌 撰文)

现代台湾寺庙建筑的新样貌

颜娟英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讲者简介：

颜娟英，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史博士。曾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1988—1995），兼任教授（1995—）、史语所考古学组主任（1996.8—2001.3）、台湾中央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2001.8—2003.7）。著有《蓝瑛与仿古绘画》、《台湾美术全集》、《台湾近代美术大事年表 1895—1945》、《风景心境－台湾近代美术文献导读》等；编著《台湾学者中国史论著—美术与考古》等。



本次讲座主要将台湾彰化市的南瑶宫观音殿与台中后里的毗卢禅寺进行对比研究，以表现现代台湾寺庙建筑的特点。

南瑶宫位于彰化市南瑶路43号，清代旧城南门外，原来是一座妈祖庙，现在变成了一座观音殿。1915年时南瑶宫已经有妈祖木雕像九尊，分属九个妈祖会。妈祖像有可移动性和扩散性，这一点与佛像不同，妈祖像很小，木制而成，因而比较轻便。妈祖信仰在地方上形成祭祀圈，妈祖像可以被各个地区轮值供奉，因而其移动性很强。南瑶宫的特点是拥有诸多的妈祖会，各地信徒组织力旺盛，各地信徒需要组团前往南瑶宫祭拜，而妈祖更会时常被其他地方信徒迎请前往家乡

祈福。

彰化南瑶宫以前是妈祖的祖殿，现在却变成了观音殿，那么这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日治时代彰化南瑶宫改建倡议始于1912年，次年正式成立改筑会，1916年底动工，新建大殿于1917年夏完工。南瑶宫改筑会的成员与台湾近代首创的金融机构——彰化银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1917年南瑶宫新建大殿落成后引起妈祖会强烈批评，1917年12月举行安座仪式，来宾几乎涵盖彰化街所有日籍官方人物和重要企业主管，却没有民间妈祖会的代表。因此，当时的南瑶宫改筑会与妈祖会不能通力合作，便失去与各大庙竞争的机会。



南瑶宫现在大殿的外观是 20 世纪 30 年代建成的，其三川殿门口立有一块“沿革碑”，碑文认为 1917 年的改建是失败的，所以到 1920 年代后期再次进行改建，形成今天的外貌。1917 年落成时，南瑶宫大殿的建筑形式采用的是明治时期的风格，外表像西洋建筑，殿顶为圆拱形，但大殿内全部是木制结构，整座建筑和洋混合，西洋和日式的传统互相搭配，并没有完全采用西洋当代建筑的架构，但大殿的设计依然采用了很多西洋元素，比如回廊立柱，以及扇形阶梯等。

由于改筑会领导的南瑶宫新建工程募款不足，原定第二阶段兴建的连接大殿和三川殿的廊庑以及后殿都无法开工。1919 年初，妈祖会正式提出由他们主导，重新修建南瑶宫。台湾传统土人张丽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记》中有相关记载：1917 年所建的南瑶宫大殿貌似西洋式宫殿，并非传统的供神之庙，加之造价昂贵，所以遭到人们的抨击。

第二次修建过程中，妈祖会将妈祖像迁出 1917 年建成的大殿，移至他们完成的传统形式的新大殿，并将原来的妈祖殿改造为观音殿。现在的观音殿正面空间变得极为局促，同时被回廊所遮挡，进入殿内来看，外面有两个妈祖像，中间是观音像，平顶方格的天花板来自日本建筑的传统，尤其是明治时期的洋风建筑，往往采用几何图案的木料装饰，大殿的左右墙有十八罗汉的泥塑，大殿屋脊上的装饰与原来差异很大，由巨大而夸张的水泥塑变成低矮的装饰，此外大殿采用的繁复的水泥的装饰在当时也很流行，很多传统的木雕都变成了水泥。

南瑶宫大殿左右侧面的阶下各有一对西式铜造立灯，宛如街灯，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1917 年落成之

后，彰化市政府特地在从火车站到南瑶宫的路上安装路灯，方便朝圣的人群。南瑶宫大胆采用西洋式建筑，当然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香客。

与日本明治时期的建筑相比，南瑶宫新式建筑具有重要的意义，大殿的改造以传统的匠师为主，选择性吸收了新式建筑的表现技法。第一次改筑会的主导人实施现代财务管理，将妈祖会的财产变为公有，且存入彰化银行，这对传统的妈祖会是很大的打击。但是改筑会坚持修建的西式大殿最终还是受到了传统信徒的攻击，被迫取消大殿的地位，成为次要的殿堂。

之后，颜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台中市后里的毗卢禅寺。该寺 1928 年开始建筑，1929 年基本完成，1930 年禅寺完全落成。“毗卢禅寺”四个字乃是吴佩孚所题写。毗卢禅寺是完全西式的建筑，屋顶与京都的帝国博物馆很类似。

毗卢禅寺是台中当地望族吕厚庵的妻子林氏及其女儿创立，以女众为主。吕厚庵很早就去世了，林氏与其育有四个女儿。林氏 1925 年皈依觉力法师（1881—1933），法号觉满。从皈依时的照片来看，林氏和她的女儿没有一个人剃发，没有受戒成为女尼，所以应是带发修行。



禅寺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厢房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大雄宝殿前面还有庭院，寺院中释迦佛头顶上的华盖，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当然日本佛像上的华盖，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认为毗卢禅寺是西式建筑最直接的证据，是毗卢禅寺与台中物产陈列馆很相似。台中物产陈列馆 1908 年建成，用于陈列台中地区的丰富物产，当时很多文人都喜欢去陈列馆参观，如前面提到的张丽俊每



次到台中都要去陈列馆游览。

林氏去世以后,女儿妙觉 1928 年开始建造毗卢禅寺,她可能有意识地模仿了台中物产陈列馆。毗卢禅寺与南瑶宫很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并不依靠香炉钱,因为吕家是望族,拥有大量土地,可以供应寺院日常所需,而南瑶宫需要依靠的是妈祖会祭祀圈的人。林氏在她去世之前就决定要建造寺院,她在太平山买了一片土地,1928 开始建筑时,吕家也曾捐助一笔钱。当时的建筑监工也是吕家的人,是林氏女儿的堂兄弟,曾赴日本庆应大学留学,毗卢禅寺以及台中物产陈列馆体现的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公共建筑中常见的建筑形式来自于西洋的罗马式殿堂。

毗卢禅寺多少具有一些贵族寺院的性质。从照片

来看,林氏的四个女儿和吕家其他房的两个女儿虽然穿着在家居土的衣服,但还留着头发,而且发型很可能还相当时髦。颜老师在采访吕家后代时得知,她们在毗卢禅寺出家时还带有自己的佣人,林氏的两个女儿去世较早,最后的一个女儿法号妙本,到了 1970 年代才正式剃发出家。

毗卢禅寺在台湾寺院文化里有着特殊的 value, 它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在保持中国佛教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了西洋元素,积极应对现代化、公众化的转变,最终成为现代的佛教寺院。

(韩艺丹 整理)

关于日本的禅宗研究

小川 隆

驹泽大学综合教育研究部教授

讲者简介：

小川隆(Ogawa Takashi),1983年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禅学系毕业,曾作为高级进修生在北京大学留学,2009年,于东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禅学思想史,特别是唐宋时代禅宗文献的思想史解读。现为驹泽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语录の思想史》(东京:岩波书店,2010,中文本:《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何燕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神会——敦煌文献と初期の禅宗史》(临川书店,2007)及《语录のことば》(京都:禅文化研究所,2007)等。



这次讲座葛老师给我的题目是“关于日本的禅宗研究”,我在邮件上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奇怪,禅宗研究不就是研究禅宗吗,有什么日本独特的研究吗?后来葛老师给我寄来一篇他正在修改的文章,是关于胡适的禅宗史研究的。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才开始考虑的确日本的禅宗研究和中国很不一样,但越考虑发现问题越多,没办法整理出来。后来我下决心根据我自己的求学经历来讲讲日本禅宗研究的情况,也许不能作为大家一个好的学习榜样,但可以作为一段口述历史,一个活的材料供大家参考。

我是1961年生的,70年代后半期在日本的一个小城市读了高中。高中时期第一次去一座临济宗的禅院坐禅,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很差,心里很苦恼,去禅宗寺

院打坐一下很想寻求解脱,我也是那时候开始对禅宗感兴趣的。在书店里偶然看到了岩波文库的《临济录》觉得很有意思,书也很便宜,就买下来了,但我看不懂那本书,当时对自己很失望。

1979年我考上了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禅学系。日本几个主要的佛教宗派都有自己的大学,比如驹泽大学就是日本曹洞宗开设的学校,花园大学是临济宗办的,龙谷大学则是净土真宗办的。明治时代,这些大学和现在中国的佛学院是一样的,专门用来培养和尚。在二次大战之后,这些宗门大学也发展成为一般的综合大学,比如驹泽大学现在有七个学部,包括佛学部、文学部、法学院、经济部、医疗科学部等。葛老师在讨论禅宗研究的时候把佛教内部的研究和学院的佛学研究分开来讲,这



在中国是很自然的,但在日本就不能这样分开来。在日本,佛教教团里有宗门大学,宗门大学里有佛教学部,因此学院本身就在佛教内部。日本佛学研究的主要力量是这些宗门大学的佛学部。除了这些宗门大学,一些国立大学也有印度学、佛教学这样的专业,但是在国立大学进行佛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也来自寺院。不要说宗门大学,即使是在国立大学的佛学研究也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护教性,带有护教性是我今天要讲的日本佛学研究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日本的佛学研究和中国研究是分开的。日本做佛教研究的都是属于印度学佛教学学科的,他们参加的是印度学佛教学学会,还有一个很大的学会叫日本中国学会,研究中国文学和哲学。日本佛教研究的学者虽然梵文、藏文很好,但汉学基础很弱,对中国的事情知之甚少。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学习禅学。日本的学校是四月份开学,五月我第一次去看神保町的书店街,偶然买到了日本筑摩书房六十年代出版的《讲坐禅》,这套书一共八卷,它把禅宗的思想、修行、生活、历史、文化等介绍得很全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参与这套丛书写作的作者也是各种各样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宗门的禅师,第二类是宗门大学的学者,第三类是京都学派的哲学家,比如西谷启治、久松真一、阿部正雄,他们都是京都大学研究哲学的教授,也是西田几多郎的弟子。哲学家和宗门的和尚看起来是水火不容,实际上并不是,京都学派哲学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很重视参禅的体验。这套丛书里有入矢义高先生和柳田圣山先生的文章,这两位先生是代表日本20世纪后半期禅宗史研究的大学者,但在这套丛书里看起来他们还处在边缘位置。

在一篇“禅宗与中国文化”的演讲稿中,葛老师开头先说明自己的立场,说自己是一个历史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去看禅宗。为说明这一点,葛老师打了一个比喻,对禅宗感兴趣的都是爱好者或者信仰者,他们就像在前台看戏的观众,把戏当作真,和台上的演员同悲共喜,而历史学者常常去后台看,看到的不是青春靓丽的演员,也不是感人肺腑的剧情,而是卸妆后的真实情况。借用这个比喻,《讲坐禅》这套书主要是参与唱戏

的戏迷来写的,不是观众也不是历史学者。80年代日本研究禅宗的力量主要是演员和戏迷,他们遵循一个共同的前提:相信有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历史、超越一切的绝对的“禅”本身。

1983年毕业后,我继续了硕士学习,那时候我名义上的导师是田中良昭教授,实际上教我的是石井修道教授,田中教授研究的是敦煌的禅宗文献,石井教授主要研究宋代禅宗。当时禅学科老师的研究领域分为宗学、禅学、禅宗史。宗学研究宗师和宗典。宗学以外的禅学研究都叫禅学,禅学的观点、立场都和宗学一样,只不过研究的材料不一样。禅学史这个词很早就有,但在70、80年代是有特殊含义的,特指和宗学、禅学划清界限,脱离护教、说教,做成一门像学问的学问,这个意义上的“禅宗史”是从柳田圣山先生一部很有名的书《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开始的。这本书是1967年出版的,专门研究初期禅宗的历史和文献,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在当时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使禅宗史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问。80年代说禅宗史就意味用敦煌文献研究早期禅宗史。还有另外一条研究的路线是入矢义高先生开拓的解读禅宗语录的研究。入矢先生不是寺院出身,是京都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本是为了探讨汉语史才开始研究禅宗语录,却慢慢被禅宗语录吸引住了,后来就一直研究禅宗语录。在入矢先生的指导下60年代末到80年代又出了《禅宗语录》系列丛书,共17卷,是语录的日语翻译,文本校勘的精细、翻译的准确、注释的详细度大大提升。入矢先生之后,阅读禅宗语录也成了一门学问。

研究历史和文献只能研究到马祖禅师(公元709—公元788),研究禅宗语言、禅宗语录就研究宋代禅宗,如何打破这样的界限,是我们一直探讨的问题。葛老师在演讲中提到了两条路,一条是观众的路,一条是历史学者的路,而我们选择了第三条路,即研究剧本的路。剧本里面有事实,也有虚构,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作品来加以研究和分析。

(吴洪斌 整理)

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趋向

——黄进兴、李孝悌、葛兆光三人谈

讲者简介：

黄进兴，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史学理论。著有《皇帝、儒生与孔庙》、《优入圣域》、《圣贤与圣徒》、《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等。

李孝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中文及历史系主任。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与文化史、城市生

活史。著有《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 1901—1911》、《昨日到城市：中国近世的逸乐与宗教》等。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著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2015 年 9 月 9 日下午三点到五点，由文史研究院举办的文史讲堂第 95 场——《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趋向——黄进兴、李孝悌、葛兆光三人谈》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2801 报告厅进行。讲座开始之前，报告厅内已座无虚席，报告厅外人头攒动。本次讲座采取了三人对谈这种新的形式，首先由葛兆光教授提出问题，黄进兴教授和李孝悌教授分别回答。本次讲座围绕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趋向展开，三位嘉宾各抒己见，为听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精神盛宴。现将三位嘉宾的对答简述如下：

葛教授在对两位嘉宾做了简短的介绍后，首先向黄所长抛出三个问题：第一，现在大陆的思想史研究还很热，为什么西方却冷淡了？请介绍一下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情况。第二，黄所长在《蜕变中的“思想

史”——一个史学观点的考察》一文的末尾引用英国名将麦克阿瑟的话“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来形容思想史，又说“新文化史是思想史的浴火凤凰”那么为什么说新文化史是思想史的浴火凤凰？第三，台湾的思想史研究情况如何？台湾《思想史》集刊已经出版到第四辑，为何要专门办这样一本杂志，这是否说明在台湾思想史研究还是很兴盛？



针对第一个问题，黄所长首先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西方，有一位教思想史的教授在他的研究室门前贴海报说道：“不要跟我谈思想史，我绝对不是教思想史的。”由此



可见思想史在西方地位的没落。黄所长表示每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其实不一样,比较于政治、外交、军事、制度史,思想史比较晚起。从整个西方的脉络来讲,思想史在19世纪末才刚刚兴起,它必须借助很多其它学科的理论来发展,因此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受到影响,稳定性比较差。比如,思想史有欧陆的脉络,也有美国的脉络,笼统说来都是思想史,但基本运作原则,从理论到方法上都非常不一样。在当下西方学界讲思想史,好像就是落后的、封建的,因为西方的思潮变化太快,令人目不暇接,几乎十五年一轮,你跟不上它。黄所长认为,思想史在中国大陆,台湾来讲意义不一样,我们要站在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上,从对中文的文本解读下功夫,慢慢找出自己的一条路来。



第二个问题,黄所长幽默地说这是李教授的看家本领,他就不掠人之美了,紧接着来谈台湾思想史的状况。在黄所长看来,台湾思想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是1970年代中期,当时有他老师辈余英时先生和林毓生先生,二人研究取向不一样,林先生采用“分析式的思想史”,不满前人只是叙述性思想史的做法,余先生则以“内在引路”来解析清代思想史,在文史哲界影响巨大,《思想史》杂志虽在继续,但常常稿源不断。黄所长进一步表示就台湾来看,现在文化史、宗教史、医疗史是主流,思想史做的人较少,但也不能说是完全的没落,还是有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人在研究。

黄所长的精彩回答过后,葛教授接着向李孝悌教授提出一系列问题:新文化史为什么成为思想史的浴火凤凰?传统的经典文化史和现在的新文化史的差异是什么?李教授为什么现在这么关心城市?现在新文化史在研究城市的时候,背后的理论是什么?随着各

种图像资料、声音、下层文本、社会调查大量出现,历史图景会不会碎片化?



李教授首先介绍对自己影响最大,自身花时间最多的是西方思想史,尤其是西方近代思想史,后来对社会史产生极大兴趣,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葛教授提的关于经典文化史的问题,李教授表示经典文化史处理的是文学、艺术和科学、哲学的经典作品,经典文化史的影响很大,甚至到现在都没有消失。至于什么是新文化史,没有办法去界定,它包含的疆域太广,其理论是多元的,处理的主题也是多元的。如果要区别它与经典文化史,那就是新文化史主要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强调建构在很多方面是反启蒙的,因此文化史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社会史的反动。关于新文化史琐碎化的问题,李教授表示不仅是新文化史,每个学科都可能出现极端的琐碎化,琐碎化的确是一个问题,但不应就此来责怪新文化史,因为新文化史有极强的反省性,琐碎与小不一定有关系,小的东西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就像是所建大厦的基石,必不可少。例如衣食住行,虽琐碎却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值得研究。如果我们把晚明所有文化史的细小方面观点,就会透露出一个极大的思想史意义。最后,李教授说思想史和文化史有相当类似的地方,都非常重视文本,重视对文本深意的解析。并说明自己现在主要做上层的东西,因为对精英文化充满敬仰,加之在美国读书时,受到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巨大影响,所以现在热衷于做城市研究。



在李教授充满信息量的回答之后,葛教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新文化史不只是处理一些碎片化的东西,只做声色犬马的研究,文化史的很多先驱,他们做的看似具体的题目,在背后巨大的关怀下解决大问题。比如早期做印刷史的人,他的目的是讲清楚欧洲的知识普及;做火

药研究的人,目的是讲明欧洲国王的军队是如何越来越强盛,以至于能跟神权相抗。在经典文化史的问题上,葛教授提出疑问,存在一些问题难以处理。即什么是文化?以前文化史书中“文化”是无所不包的,那文化是不是涵盖了所有历史。如此,它的边界在哪里?另外中国文化史的“中国”是什么?因为从古至今,中国的边界在不断的变化,因此葛教授主张应给“中国文化史”瘦身,让它有边界,有目标,有轴心内容。就思想史的问题,葛教授表示思想史在中国方兴未艾,因为它表面上是处理历史问题,实际上跟很多现实关怀连在一起。但是葛教授指出,思想史兴盛的背后也面临很多挑战。第一个就是新文化史的冲击,眼光逐渐向底层、向边缘,也逐渐讨论一些物质化问题;其次是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挑战,诸如权力、话语、系谱、知识考古、东方主义,包括现在流行的反向东方主义;第三个挑战是对边缘的关注,不再集中于原来占主流的、经典的、精英的思想上。

面对这些挑战,葛教授认为我们既要学习这种超



越国境的研究方式,但站在中国的立场,应找到一条把思想史和文化史沟通起来的路。对此,葛教授建议:“中人阶级”在上层和下层之间起串联作用,一旦上升他就成为精英和领袖,一旦下浮他就成为民众。这样一批人的观念是不是可以研究?如果这些人的观念可以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中心的话,或许可以沟通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

(司俊飞 整理)

《朝鲜通信史文献选编》暨《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新书发布会纪要

2015年9月7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复旦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暨《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新书发布会在我院举行。本次新书发布会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朱莉丽主持,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教授、文科科研处葛洪波副处长、亚洲研究中心金光耀主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王德耀董事长分别在会上致辞。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发布并介绍了《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日本驹泽大学综合教育部小川隆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莉丽副研究员、张佳副研究员、王鑫磊助理研究员、段志强助理研究员介绍并发布了《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出席本次新书发布会的还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尚胜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胡令远、徐静波教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石源华教授,各位专家学者就朝鲜通信使文献的价值、出版意义与影响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从周边看中国”是葛兆光教授在创立文史研究院之始便提出的一个研究方向,其旨趣在于通过中国周边各个文化区域留存的各种文字的资料,反过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八年来在葛老师的带领下,经过各位同仁的不懈努力,文史研究院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是继2010年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2011年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之后,文史研究院编订出版的第三套反映东亚中、日、韩、越交流状况的使行文献,是在葛兆光教授的带领下,由朱莉丽、王鑫磊、张佳、段志强作为执行编辑,历时2年编辑而成,黄修志、钱云、徐凡、楼正豪、朱海晶五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也参与了文献的整理工作。



“朝鲜通信使文献”，指的是14—19世纪朝鲜王朝派往日本室町幕府、丰臣政权、江户幕府和明治政府的官方使团中，一些使臣或随员用汉文写下的各种记录。在总共六十多次朝鲜通信使往返中，留下了大约四十种左右通信使记录。此前，收集数量较多的朝鲜通信使文献的总集，分别是韩国的正续编《海行总裁》以及日本整理的《(善邻と友好の记录)大系朝鲜通信使》八册，而中国学术界在通信使文献的整理上尚处于缺席状态。此次文史研究院整理编订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五册，弥补了中国学术界在通信使文献整理上的空白。此《选编》选取了从1420年到1876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朝鲜使节使日行记十八篇，这些文献一方面反映出十五世纪以来朝、日两国在政治、文化上的交涉状况，另一方面反映出传统中国向周边漫延开来的古典知识、礼乐制度和艺文意境，是如何构成了此时朝鲜和日本在文化上相互竞逐的背景和评判标准。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尽管主要看到的是日本与朝鲜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但也有中国的文化存在，展现出的是当时东亚整体的文化状态和知识面貌。



作为《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项目的发起者和带头人，葛兆光教授在发布会上详细讲解了《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研究

起因、研究过程、已经取得的成果及研究中遇到的主要困难等。葛老师着力讲解了朝鲜通信使文献研究对于中国，尤其是研究中国的人有什么意义。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既有沟通作用，也有阻碍作用，而在古代朝鲜和日本的交往中，中国往往以“不在场的在场者”形象出现。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对于研究当时东亚各国的政治、文化与经济有着重要的“情报”意义，对于重新审视东亚各国文化之间的认同、自尊与比赛，探究东亚文化竞赛背后的传统中国文化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王振忠教授在讲话中说到“这一套资料虽然不是朝鲜通信使文献的全部，但它是一种引领学术风气的重要成果，较之此前朝鲜燕行录、越南燕行文献的出

版，更具有填补空白意义。它可以提醒国内的学者，应当重视这些用汉字书写的域外文献。我相信，随着这一套文献资料的出版，围绕着朝鲜通信使相关的东亚研究，必将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

金光耀主任在致辞中也讲到，文史研究院的“从周边看中国”项目在葛兆光教授的带领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0周年确立的“亚洲历史与文化”资助方向是非常吻合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等相关的各项成果引领了学术研究的新风气和新方向，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

《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则是“从周边看中国”研究方向在专门研究上取得的成果。该丛书收录有关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学术著作，尤其鼓励跨越艺术、宗教与历史多个领域进行综合研究的年轻学者的学术著作。自2013年10月至今，该套丛书已收录了五部专著。



日本禅宗思想史的研究专家小川隆先生的——《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旨在透过禅宗昌盛时期的、中国唐宋时代的代表性文献，解读各个时代禅宗的思维与表达，考察其在20世纪以何种形式被理解、被建构而形成为今天禅宗言说的问题；朱莉丽副研究员的《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以策彦周良的《初渡集》为中心，结合其他遣明使的记录，透过他们的视角对明朝的政治现象、国家制度、社会生活、精神信仰等进行分析，从交流史的角度对以往关于明朝制度史、社会史、宗教史的研究进行补充，并分析了经由遣明使活动体现的明代中日交流的情况；张佳副研究员的《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从衣冠服饰、婚嫁丧祭，日常生活中的礼仪细节



探究明初礼俗改革,归纳了明初礼俗改革的两大内容:一是遵照儒家政治理念,对元代因“宽纵”而造成的各种失序现象进行严厉清整,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二是以“用夏变夷”为旗号,对元代社会生活中弥漫的“胡风”进行清整,恢复汉族的文化传统;王鑫磊助理研究员的《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将东亚看作一个互动交流的地域系统,将中国放进这个系统当中去考察其历史和文化问题,选择文献数量、质量情况相对均属最优的朝鲜半岛为对象,研究时段上则将重心放在对近世以来的中国,通过个案呈现,为东亚互动视野下研究中国历史这一方法提供注解;段志强助理研究员的《顾祠——顾炎武与晚晴士

人政治人格的重塑》则聚焦于晚清一座祭祀明末大儒顾炎武的祠堂,讨论了历史人物如何能成为刷新士林风气的资源,并成为政治偶像的过程。

五部著作虽然各自主旨和内容不同,但均展现了利用亚洲的史料,研究历史上的中国,以及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新的角度、方法和视野,这也正是“从周边看中国”研究方向设立的初衷。

在发布会最后时间里,与会学者就《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两部书和如何利用域外史料进行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自由讨论。

(汤克凤 撰文)

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踏查记之二

李星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

去年初，我院与上海辞书出版社签订了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编著的12卷本《中国文化史迹》协议，计划对上个世纪20年代常盘大定、关野贞率领的考察队所调查拍摄的古代遗址和文物做部分实地核查，了解这些遗址和文物的现存状况。去年7月30日至8月17日间，我院组织了第一次踏查，踏查队由我和院长杨志刚教授、邓菲副研究员和博士研究生钱云和邵小龙组成，沿着当年日本学者的足迹，到河南洛阳、巩义、安阳，河北邯郸、峰峰、正定，山西太原、五台山、大同等地，考察他们当年曾经拍摄的陵墓石雕、寺院建筑、碑刻铭文、石窟造像等遗迹。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文物已经损毁，或者样貌发生改变，《中国文化史迹》中所保留的当年拍摄这些文物的图版已经成为现在唯一可资利用的图像资料，出版这部著作的中文版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发现当年常盘大定等人在编写过程中出现许多讹误和混淆，这会对使用这些图像资料的学者产生误导。因此，我们决定扩大对这部著作所涉及的史迹和文物的踏查与核对的范围，尽可能地纠正其中的错误。

我们原计划今年暑假，由两位教师带领两位博士生进行第二次《中国文化史迹》的实地踏查工作，但是由于另一位教师和两名学生均有事无法外出踏查，所

以我独自一人在7月21日至8月8日间，到《中国文化史迹》所涉史迹和文物较为集中的河南开封、登封和陕西关中各县进行实地踏查。

这次踏查，我首先到河南开封。开封曾是北宋国都和明代周王府所在地，文物古迹众多，当年常盘大定、关野贞一行对开封的重要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调查和拍照。7月21日中午到达开封之后，我首先赶到位于市区西北部的龙亭遗址。这里原是北宋皇宫后苑的一部分，明代周王府的煤山位于此地，清代康熙年间在煤山建造万寿亭，遂更名为龙亭山，现存高台建筑为



河南省开封市相国寺罗汉殿旧照(《中国文化史迹》误称为“龙亭”)



河南省开封市相国寺罗汉殿现状

清代重檐歇山式大殿，坐北朝南。殿顶覆黄色琉璃瓦，殿四周有石雕围栏，殿正面石阶梯分三层 70 余级，左右石级中间嵌龙纹丹陛石。在龙亭上南望，可见开阔的潘湖和杨湖。《中国文化史迹》中并未收录龙亭遗址的照片，但是却收录了位于市中心的相国寺罗汉殿的照片，将其误称为“龙亭”。随即，我又赶到相国寺，去核查被误称为“龙亭”的罗汉殿。相国寺原为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555)的建国寺，唐延和元年(712 年)五月至七月唐睿宗将此寺赐名大相国寺，明末毁于黄河洪灾，现存寺院主体建筑为清带乾隆年间重修。罗汉殿也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遗构，经过近年翻修之后，建筑形制基本保持原样。罗汉殿由中心八角亭与周边八角回廊构成，顶覆绿色琉璃瓦，在中国古代寺院建筑中造型颇为奇特。之后，我又去位于北门大街的铁塔公园，去调查北宋开宝寺遗址。此寺地面殿堂建筑全部损毁，《中国文化史迹》图版所示当年场景均已改变，唯独始建于皇祐元年(1049)的开宝寺依然伫立在原址。此塔平面为八角形，13 层，约 55 米高，塔身嵌砌铁锈色模印琉璃砖，模印图像有佛教、菩萨、供养人、乐伎、飞天、麒麟、狮子、花草纹等。远远望去像是铁柱的一般，俗称“铁塔”。在过去的 960 余年中，此塔经过了多次地震、水患和兵灾，受到损坏，明代以来经过多次修补。明代洪武二十九年(1396)的维修较为重要，塔内盘旋而上的阶梯通道侧壁嵌置的 48 尊黄色琉璃阿弥陀佛，就是此时制造的。铁塔的现存状况与《中国文化史迹》的图版相比，并无太大的变化。

第二天早饭之后，我来到开封市东南郊区的繁塔。繁塔被围在一圈小院墙之内，外面是拆迁过后遗留许多建筑垃圾的空地。繁塔所在地原是五代后梁高祖朱温的讲武台，称为繁台。后周显德二年(955)在繁台上建天清寺，北宋开宝年间(968—975)又在寺院内建造兴慈塔，是开封现存最古老的佛塔，因处于繁台之上，俗称繁塔。繁塔在宋代曾为一座六角九层的高塔，是当时开封最高大的佛塔。明代初年，塔身严重残损，仅余三层，后来在大塔第三层之上又建小塔六级，使此塔外貌变得十分奇特，《中国文化史迹》图版中的繁塔就是这个样子。塔身外壁和塔内壁面上嵌砌数十种模印浮雕佛像砖 7000 余块，包括释迦佛像、弥勒佛像、阿弥陀佛像、菩萨、罗汉、伎乐、龙凤、缠枝花草纹等，工艺精湛。第一层南面塔洞甬道东西两壁各镶嵌有石板，东壁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西壁刻《十善业道经要略》。上世纪 80 年代，对繁塔进行了大修，替换了少量残砖，基本保持明代的面貌。拍摄完繁塔之后，我去了开封市博物馆，那里陈列着开封市出土的文物，其中有铁塔、繁塔和龙亭等遗址出土的相关文物，我也做了资料收集。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兴教寺
玄奘舍利塔旧照

7月23日我到达西安，西安市内及周边历史遗迹是当年常盘大定、关野贞一行重点考察的对象之一，《中国文化史迹》的第九卷全部是西安及其周边历史遗迹的内容，我开始走访他们曾调查并留下照片的那些佛寺。这些佛寺包括市区内的荐福寺、慈恩寺、兴善寺、

卧龙寺、青龙寺、崇圣寺遗址和宝庆寺塔，长安区的香积寺、兴教寺、华严寺、牛头寺、草堂寺，还有临潼区的华清池和三原县文庙等。《中国文化史迹》图版中所显示的这些佛寺建筑、碑铭和造像的情况，其中各寺砖塔基本保持原样，有些建筑经维修基本保持原貌，另一些则由于完全损毁而重新建造，例如牛头寺和青龙寺的新造建筑与《中国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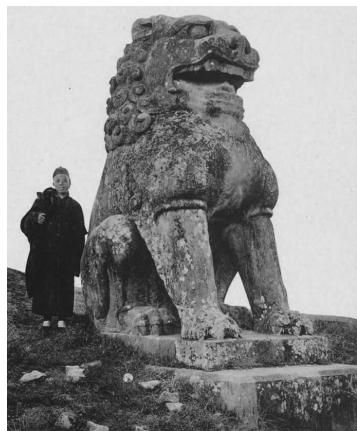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兴教寺玄奘舍利塔现状

史迹》中的图版相比,已全部改观。多数碑碣保存较好,一部碑碣被移往他处,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被埋入地下保存。《中国文化史迹》中的香积寺石刻造像已经无处可寻。牛头寺的石经幢,据寺僧所言已经掩埋地下。慈恩寺大雄宝殿阶梯下两侧的众多石碑已经搬走。香积寺小砖塔上的神王石刻不知去向。卧龙寺门前明清时期的石牌坊已被拆除,仅在寺院内的墙根下看到部分构件。崇圣寺的石牌坊和山门已经荡然无存,存于此处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早已移入碑林博物馆陈列。从《中国文化史迹》图版来看,当时宝庆寺中的唐代佛教造像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原地,在之后的动荡岁月里大部分流失海外。随后,我又前往乾县

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隆和泾阳唐德宗崇陵调查,《中国文化史迹》图版中的碑刻和仪卫石雕基本保持原貌,只是加以扶正修整而已。

另外,我还嘱咐在青海参加考古发掘后返回西安的我院博士研究生杨洁核查《中国文化史迹》图版中所录碑林博物馆暨文庙和礼泉县昭陵



陕西省乾县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南门东侧石狮旧照(《中国文化史迹》误称为“昭陵东方石狮”)

陪葬墓的碑刻和建筑遗址的现存状况。碑林博物馆所藏碑碣大多安然如初,原来西安文庙的建筑除了大成殿被拆除之外,其他建筑经过维修大体保持原样。昭陵的唐代墓碑,多数已经移入昭陵博物馆陈列。《中国文化史迹》图版标有所谓的礼泉昭陵“东方石狮”,经杨洁核对,是一处讹误,这尊石狮实际上是乾县乾陵南门东侧石狮。《中国文化史迹》对这尊石狮的误标,使得一些学者误以为昭陵曾经存在过一尊东门石狮,这次的纠正十分必要。



河南省登封市嵩阳寺伦统碑旧照(《中国文化史迹》误称为会善寺“嵩阳寺碑”)



河南省登封市嵩阳寺伦统碑现状

8月1日结束在西安的考察之后,我前往河南登封继续踏查。登封地区汇集了众多的儒释道历史文化史迹,也是常盘大定、关野贞一行重点考察的地区之一,收录的文物照片占《中国文化史迹》第二卷将近一半和第五册一部分的篇幅,其中包括中永泰寺、嵩岳寺塔、法王寺、会善寺、刘碑寺、少林寺、初祖庵、二祖庵、塔林、太室石阙、少室石阙、启母阙、中岳庙、嵩阳观、崇福宫和嵩阳石淙等遗址中的建筑、碑碣和造像等。其中,中岳嵩山之神像已非原来的塑像。崇福宫中的泛觞亭遗址的泛觞石槽在文革中毁坏,现在为重新修造的。二祖庵正殿已被拆除,正在原址上兴建更大的新殿,二祖像被包裹起来,无法拍照。永泰寺内石雕香坛的上部遗失,仅剩残损的蟠龙底座,寺后的两座砖塔也只剩下一座。此外,《中国文化史迹》中所称会善寺“嵩阳寺碑”也是一个讹误,

此碑乃为存于嵩阳观的东魏天平二年(535)《嵩阳寺伦统碑》，背阴中部造像遭到严重损坏。登封各寺观中其余的建筑、碑碣和造像等均基本保持原貌，一一进行

了拍照。8月8日我结束了在登封的考察，经由郑州回到上海。



对马岛探访问记

王鑫磊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对马岛是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的一个小岛，面积 708 平方公里，人口不到 4 万，为日本属岛。今年八月，借着前往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学的机会，我终于得以踏上这座向往已久的岛屿，进行了一番实地探访。

几年前开始阅读朝鲜通信使文献，就注意到了对马岛的存在，而随着对相关历史的深入了解，我对它的兴趣也日益浓厚起来。

对马岛虽属日本，但它与韩国釜山之间的距离为 49.5 公里，而距日本福冈 138 公里，即从地理上来说离韩国更近。历史上，对马岛人曾长期依靠经营朝日贸易维生，并且经常以接济或赏赐的方式，接受来自朝鲜王朝的经济支援。自朝鲜王朝建立之初起，在官方文献记录中就经常出现所谓的“归化倭人”、“向化倭人”，而这些人多数就是对马岛人，他们为摆脱在对马岛的艰苦生活，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医术、武力、航海技术、语言能力等）在朝鲜政府中谋得官职，并融入朝鲜社会之中。

1419 年，朝鲜王朝以讨伐倭寇为名，派兵占领对马岛（日本称“应永外寇”），对马岛的主政者宗氏一族接受了朝鲜的官职，而其对日本国内则称朝鲜已主动退兵，对马岛的归属并无变化。可以说，当时对马岛是

出于生存和发展的现实考虑，而主动选择了一种在朝日之间“两属”的状态。在被现代国家观念规训之前，人们的这样一种模糊的国家归属意识其实不足为奇。

1592 年，壬辰倭乱爆发，对马岛份属日军阵营，当然也参与了侵入朝鲜的军事行动，但仍有一些有趣的历史情节值得我们去关注：比如有一位对马岛的大将，因为在日本军令和朝鲜恩情之间抉择两难，不愿带兵出征，于战前剖腹自尽；又如有些对马人直接就做了朝鲜的间谍，潜伏在日军中，不断向朝鲜提供军事情报，甚至在关键时刻倒戈一击。应该说，这些基于传说和野史呈现的历史情节，进一步增加了对马岛历史的复杂性和趣味性。

壬辰倭乱结束以后，对马岛人不遗余力地进行修复朝日两国关系的努力，甚至不惜采用伪造国书的手段居间协调，最终促成了朝鲜王朝和日本在 1606 年重新实现邦交正常化。其后便进入了所谓朝日通信外交的时代，而对马岛在朝鲜通信使臣往来日本的过程中，承担了全程护卫和居间协调的任务。朝鲜和日本在经历了异常惨烈的一场战争以后，能够在短短八年间就重新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并通过通信外交的形式维系了近三百年，这其中对马岛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历史上的对马岛所呈现的种种面貌，除了让我沉

思历史事实背后的深层问题之外，也促使着我想去了解当下对马岛的状况，而通过网络检索能够得到的对马岛资料实在是太过有限，因此，去对马岛实地考察的想法已经在我心头萦绕多年，这次终于得偿所愿。

2015年8月8日早上，我搭乘ANA航空的一架小飞机，从福冈机场起飞，半个小时便飞到了对马岛。飞机共50几个座位，几乎满员，乘客大致由三部分人组成，最多的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其次是带着孩子回家看长辈的年轻夫妇，极个别的是游客。对马岛人口本就不多，据说因为经济不景气，年轻人又多数去岛外谋生，岛上剩下的多为留守老人。前往对马岛的日本游客极少，对日本人来说，对马岛还算不上是一个旅游出行目的地，在最近的能够通航对马的城市福冈，旅行社里琳琅满目地陈列着国内大小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而当我问到有没有对马岛的旅游资料时，不仅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接待人员还流露出颇感奇怪的神色，似乎是在说，怎么会有人想要去对马岛旅游呢？

然而，旅游业却是对马岛的支柱产业，只不过其旅游业的重心是接待韩国游客而非本国游客。有统计数据显示，近年到访对马岛的韩国游客达到年均30万人次左右。对马岛吸引韩国游客的旅游主题不是别的，就只有唯一的一个，那就是朝鲜通信使。在对马岛行政和旅游中心严原市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通信使的图像元素，包括海报、招牌、壁画等，而最著名的就是位于市中心的一段河堤护栏上，用通信使相关的绘画作品制成琉璃片镶嵌其中，成为一道旅游风景。

对马岛有一个乡土资料馆，该馆是岛上最大的历史文物和文献保存研究机构，同时也是韩国游客的必游景点。馆内有常设展览，展出面积不大，但是以朝鲜通信使为绝对突出的主题，其中比较重要的展品有朝鲜王朝册封对马人官职的文书、通信使行列绘卷、对马岛宗家记录文书等，以及其他一些反映通信使及韩日交流的文物，如印鉴、佛像、饮食器具等。在我看来，宗家记录文书无疑是对马乡土资料馆最具价值的收藏，这部分文书体量很大，其内容虽关涉整个对马岛的政务管理，但其中涉及对朝商贸、外交关系的资料占很大的篇幅。对这部分文献，该馆现有专人正在进行整理和研究，但进度似乎非常缓慢。



万松院是另一处热门旅游景点，它实际上是世袭对马岛岛主职位的宗氏一族的墓地和愿堂的统称。万松院山门匾题“钟碧山”，愿堂内悬匾“万松精舍”，正堂供历代宗氏家主牌位，侧间供奉着德川历代将军牌位。而当年朝鲜国王赐给宗氏家族的三件青铜铸造器物的原件，令人意外被随意摆放在愿堂一角，竟也没有加个罩子什么的，触手可及。从愿堂出来向后山去，由近百级台阶拾级而上，便到宗氏的家族墓地，墓基墓碑等大都保存完好，每个墓前有指示牌，以介绍这是某代宗氏家主某某之墓。游览万松院之际，整个景点就我一个游客，而所谓管理人员也只有进门小卖部兼售票处的一位老太太，从我进去到出来为止，她一直在观看棒球赛直播，可见当地的文物管理和保护意识，那是相当的粗放。

提到通信使和对马岛，不能不提西山寺，通信外交时代，对马岛作为朝日外交的前哨站，德川幕府对其并非完全信任，因为监督和钳制的需要，将军直接指派一名僧侣常驻对马岛，协同处理通信使接待任务，称为以酌庵长老，西山寺即其驻处。西山寺位于严原港边的半山腰，从西山寺可以清楚眺望港口全景，而从港口望来，也可一眼便见西山寺。据记载，当通信使臣抵达对马岛时辰较晚来不及赶去客馆时，偶尔会在此暂宿。如今的西山寺，总体还是给人古朴幽静的感觉，占地不大，甚至略显局促，保存着修复的山门、主殿、钟楼。寺庙主人显然颇有经营头脑，围绕着大殿的周围，新建起了一圈附楼，改造成了宿坊（即酒店），引得韩国游客争相前来体验通信使曾经下榻过的酒店。我有幸预定到了该酒店的房间，当晚得以在西山寺留宿。我的房间在最高的四楼尽头，窗口正对严原港，远眺之际，不



禁失神联想，要是时光倒流回四百年前，这里也算是观看通信使登陆盛况的绝佳位置了，恐怕是一票难求啊！

到对马岛的第二天，我先后探访了国分寺和长寿院。事实上，国分寺才是正牌的朝鲜通信使客馆。本来期望挺高，很能看到点通信使留下的痕迹，可是实地一看却大失所望，这里只有一个寺门还算保留原貌，里面所有的建筑均已翻建一新。寺庙主人一家人住在大殿周围搭建的别墅里，寺中的空地几乎都改成了为盈利出售的墓地。中年女主人清早开门出来，看到我这个不速之客，颇觉惊异。我想，此处虽在旅游手册上被标为景点，但大概当地人所指景点仅止于庙门部分而已。因此，女主人定是对我无故进入其“家中”闲逛很不理解。

长寿院亦是曾出现在通信使的记录中的寺庙，而如今这里也已焕然一新，幸好在还有一个雨森芳洲的墓地可以一看。芳洲墓在寺后半山腰，需沿着一条孤坟散布的竹林僻径而上，偶尔能见几级破烂的石阶，行路间还要十分小心不去触碰那几步一张的蛛网。芳洲墓前供奉的花是塑料的，兴许是有人为了让它看上去不是没人管顾的样子，实则令场面颇不协调。雨森芳

洲在他的年代是个颇不得志的文士，被贬来对马岛以后在朝日交往中倒起了很突出的作用。现在的研究者多承认他在文学和思想方面的造诣，而对马的乡土史研究者则更突出强调其为所谓的“韩日诚信外交”所做的贡献，其实说白了也有现实的考虑，因为这样才会有韩国游客愿意爬上这里来看墓碑和“鲜花”，不是吗？

在对马岛的两天，除了在严原市中心和热门旅游景点还能看到不少往来的韩国游客外，走在其他的大街小巷都很少看到行人，感觉很清净。岛上完全没有任何高楼建筑，多数是破旧的矮房，倒是给人一种古朴的感觉。从全貌来看，对马是一个山峦遍布的海岛，没有大片平地，踏上岛以后就感觉置身山区之中。总的来说，现实中的对马岛，和我原本想象中的反差不大，经济不发达，人气也不足。

然而，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对马岛的经济长期倚赖朝鲜半岛的状况，现在似乎还在以一种旅游经济的方式延续着。据说，因为旅游经济主要面向韩国游客，在若干年前，对马岛的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韩语标识，不仅如此，一度还有很多韩国人有组织地来到对马岛购买地产，险些令整个对马岛产权易主。这致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干预，消除韩语标识、回购地产以及鼓励本国人民来对马岛旅游等。虽然现在对马岛的街头已经几乎看不到韩语标识，可是一些源自于历史且深植于历史中的东西，恐怕一时之间还难以彻底扭转的，而对马岛在韩日关系中的定位问题，大概也尚处于进行时中。

从“四夷”到“外国”:《宋史·外国传》研究

钱 云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

在传统中国的历史书写传统中,正史中常用“四夷传”、“夷狄传”等来作为有关域外周边记载的列传类目名称,不言而喻,依据的是古代经典中“中国—四夷”的世界想象。元朝史臣修宋、辽、金三史时,令人瞩目地改变前代正史中“四夷传”、“夷狄传”等有关域外周边记载的列传名称,而分别以“外国传”与“蛮夷传”的名称来记载。在此之后,“外国传”似乎得到史学编纂者的默认,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史书体例。“外国传”作为正史的列传名有何意涵?为什么在元修宋史时出现了“外国传”?“外国传”的出现反映的是宋代的事实还是元代的观念?这些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

本文除绪论与结论以外,共分为六章。此外,还有三篇附录,分别是《诸书有关域外传目对照表》、《百年来两宋出使行记之研究》和《宋史·交趾传》校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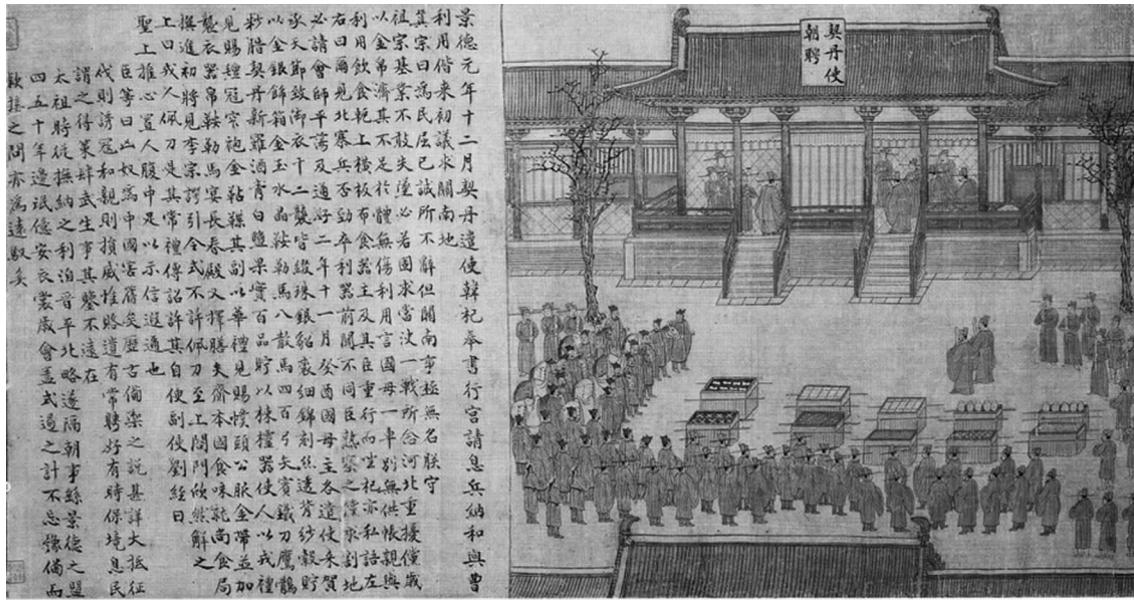
第一章(“外国传”考)从梳理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中“外国传”一词的使用,考证历史上“外国传”一名的由来及其意涵。从现存文献来看,汉唐时期僧人所纂有关南亚的史籍常以“外国传”为名,可能与流行南亚的“三/四”天子说及佛教世界观有关,但是在官方修纂的正史中,直到宋代官修国史里仍使用“四夷传”为域外周边诸列传的名称。第二章(《宋史·外国传》的



真宗永熙陵西侧客使事项之一

文献考察》从文献学、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宋代官修国史、宋代私修本朝史、宋人所撰域外书籍与元代官修《宋史·外国传》之关联,说明虽然元代史官“创造”了“外国传”作为新的史书体例,但是元代修史活动与宋代的知识世界有重要的关系,元修《宋史》的史料来源、叙事偏向、编排次第等各方面都直接体现了宋代有关域外的知识与观念。

第三、四、五章分别从知识传播与书写、宋朝的对外政治实践、宋代的“华夷观念”之发展等问题入手,说明《宋史·外国传》的知识、政治、历史与思想背景。可以说,两宋一方面在国家内部延续“光被四夷”的盛世想象,一方面又与辽、金逐渐形成并维持“对等外交”的现实。在想象与现实之间,宋朝官方根据域外诸国实力的强弱设计出一套具有等级性质的宾礼制度,构建出观念世界中一个具有层级的世界秩序,而且影



《景德四图》之《契丹使朝聘》

响到了《宋史》中有关域外周边的书写结构。另外，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使宋人在思想上形成了“中国不能无夷狄”的观点，这是对传统华夷观念的重大调整，也是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反思与接受。同时，在舆地图中，宋代人绘制了北以长城为界、南以泸水为限的国界线，这些边界是以传统“九州”思想为基础，同时与现实的政治相配合。这样宋人就通过对地理空间的确定进而对政治、文化的空间加以限定，从而确定了一个理想化的、基于自然地理、历史沿革和华夷观念的“中国”，由此“蛮夷”与“外国”的区分日渐清晰，分别用以指代内部族群与外部族群。而这些对域外周边的知识与观念在宋代历史书写、雕版印刷、科举考试等方面的发展下，也成为当时的一般知识与观念，反过来影响了宋朝国史和《宋史》的修纂。

本文的第六章〈王朝间的竞争：元修三史的背景及其影响〉从十至十三世纪“复数王朝”的正统之争来讨论元修宋辽金三史的背景，又从明代“重修宋史”风潮来考察“外国传”成为正史列传体例后的影响。从宋

代开始，宋、辽、金三朝出现了华夷、正统的竞争，思想的竞争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角力逐渐撕裂原有规整、清晰的华夷秩序，创造出“外国”意识的生长空间：宋代华夷思想在此时发生转化，一方面愈加严苛地以华夷作为正统的主要标准，另一方面则承认诸“国”并立的现实。“征服王朝”元朝的建立使得有关华夷的讨论暂时隐退，由此“外国”一名以历史、现实与合理的方式成为思考世界秩序的概念，因此在编纂前朝史时，一面将三史分立，一面又增设“外国传”与“蛮夷传”并立。在华夷讨论再次兴起的明代，“重修宋史”成为史学发展中令人注意的热潮，但是华夷并立的宋、辽、金三朝历史被承认，“外国传”作为史书体例也被继承，说明了“外国”这一概念获得了存在的空间，而“外国”与“蛮夷”的分离，也代表着传统中国世界认识中，“域外”与“域内”认识的出现。

注：该文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位博士钱云毕业论文摘要

新书介绍

- 《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朱莉丽、王鑫磊、张佳、段志强 执行编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



《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系文史研究院继《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之后编订出版的第三套反映东亚中、日、韩、越交流状况的使行文献。广义的通信使是对15—19世纪朝鲜王朝派往日本室町幕府、丰臣政权、江户幕府和明治政府的外交使节的总称。在总共六十多次朝鲜通信使往返中,留下了大约四十种左右通信使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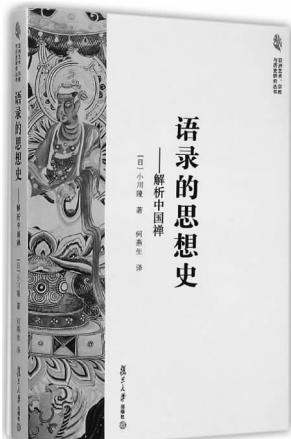
此前,收集数量较多的朝鲜通信使文献的总集,分别是韩国的正续編《海行总裁》以及日本整理的《(善

邻と友好の记录)大系朝鲜通信使》八册,而中国学术界在通信使文献的整理上尚处于缺席状态。

此次文史研究院整理编订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五册,弥补了中国学术界在通信使文献整理上的空白。此《选编》选取了从1420年到1876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朝鲜使节使日行记十六篇,这些文献一方面反映出十五世纪以来朝、日两国在政治、文化上的交涉状况,另一方面反映出传统中国向周边漫延开来的古典知识、礼乐制度和艺文意境,是如何构成了此时朝鲜和日本在文化上相互竞逐的背景和评判标准。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尽管主要看到的是日本与朝鲜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但也有中国的文化存在,展现出的是当时东亚整体的文化状态和知识面貌。

- 《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
(小川隆 著,何燕生 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

本书通过解读唐宋时代禅语录中的大量问答,探讨了各个时代禅宗的思维和表达,并考察了禅宗在20



世纪如何被理解、被建构成今天禅宗言说的问题。本书的特色在于依据文献的语句和文脉探寻其思维与含义，并非形而上的抽象论述，是作者纤悉用功而完成的禅宗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本书由四章构成。序论以著名的“庭前柏树子”问答为题材，对禅语录的解读方法进行探讨，唐宋的禅问答即见大相径庭的思维与表达。唐代禅有内部共享的问题意识为基础，在其语脉中，问答的意涵是可以被理解的，而同样的问答到了宋代，则变成了超逻辑的东西。

第二章以五代禅宗史书《祖堂集》为主要材料，对唐代禅思想进行了考察，第一节探讨唐禅主流“马祖系的禅”，第二节探讨第二主流“石头系的禅”。马祖禅的核心是“即心即佛”，是以自己的“本来性”和“现实态”的无媒介性的等同作为宗旨，而石头一派的禅则以二者为不即不离、不一不二的关系。

第三章通过对宋代禅籍《碧岩录》的解读，揭示了禅的思想与风格在宋代发生巨大变化。宋代禅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它从唐代禅对当下自己的肯定，转向寻求对超越性大悟的体验，这一转变是贯通整个北宋时期种种演变的结果。本章分五节论述，首先介绍唐代禅问答在宋代禅籍中被大量篡改性解读的具体案例；接着在第二节讨论“百丈野鸭子”话头与圆悟对马祖禅风的批判；第三、四节讨论“赵州七斤布衫”话头和圆悟的无事理念，他一方面对无事激烈批判，另一方面又追求“大悟”体验；最后一节讨论《碧岩录》中的“活句”说，揭示了《碧岩录》的特殊文献价值，它是将唐代禅问答向宋代禅的思维表达进行改读的一部著作，在集北宋时期“文字禅”之大成的同时，打开向“看话禅”的转化之路，并制约着后来禅思想发展的性格。

本书最后一章通过对胡适与铃木大拙的禅研究成果的梳理，比较考察了20世纪的禅学。从结论而言，20世纪的禅宗言说，其实就是试图将宋代禅与西方近代思维结合的一种产物。本章第一节讨论胡适以清代考据学方法与实用主义思想所确立的研究方法的情况；第二节则对铃木大拙的禅思想进行考察，指出大拙意在将禅与近代文明之间发生连动。胡适与大拙关于禅宗研究的论战背后，存在着如何回应西方近代的共同课题。

(陈玲)

- 《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段志强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张穆、何绍基等人在北京创建祭祀明末大儒顾炎武的祠堂，每年定期会祭，很快吸引了大批士大夫参与，并且延续了长达八十年之久，成为大规模的士大夫集会活动。随着公祭的举办、著作的刊行、年谱的编纂，顾炎武的个人形象逐渐突破官方塑造出的考据学大师模式，而被视作通晓社会事务的经世学者。一批关心世务的士人把顾炎武当作政治道德与政治责任的象征，并且通过顾炎武祠的交游网络联系起来，部分复活了晚明的清议传统。他们对于顾炎武的崇拜体现了对乾嘉考据学所代表的学术专精化潮流的反动，也是在召唤通经致用传统的复活。顾祠的繁荣，标志着士大夫政治文化开始走出清代前中期的自我抑制，通经致用重新成为士人的理想人格。

外刊撷英

Johannes L. Kurz, 南唐的皇室谱系(On the Southern Tang Imperial Genealog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34, No. 4 (October-December 2014), pp. 601-620.

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叙述框架实际是以北方五代历史为基础,而位居南方十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五代史的框架而被遮蔽。这种框架的形成与北宋通过取代后周确立合法性的历史进程有着极大的关系,也制约了后世对此段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有关南唐(937—976 年)皇室宗谱的各种记载,并分析这些记载的准确性及其原因,以揭示南唐王朝创立者李昇与唐皇室之间所谓宗亲关系的构造及目的,从而展现有关南唐皇室系谱记载的多重面相。

南唐实为代吴而立,由徐知诰建立于公元 937 年,最初国号为齐。两年之后,徐知诰改齐为唐,史称“南唐”。与此同时,徐志诰改名为“李昇”,宣称自己为唐王室的后裔。而后唐王朝(923—936 年)的灭亡,也为李昇的此种主张提供了契机。在这种情况下,编纂皇室宗谱,并构建起与唐王朝一脉相承的皇室谱系,就成为李昇改姓易名、创立南唐的必然选择。尽管 939 年编纂的南唐皇室宗谱已不存世,但五代十国及北宋时期诸多的历史记载,为考察这一皇室宗谱提供了线索。

有关南唐皇室宗谱的记载,主要有四个版本,即五代十国时期的实录,《江南录》、《江表志》和《资治通鉴》。而其中对南唐皇室谱系的追溯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尽管对李昇祖先的记载不同,《江表志》甚至将后唐与南唐的祖先归为同一系统,但这些材料都承认了李昇与唐皇室存在的关系,此种记载的史书也相互参照,在某种程度上使李昇与唐皇室的关系得到了“确认”;二是重新构造南唐的皇室宗谱。这一做法的代表是《资治通鉴》,司马光及其助手没有依据以往的文本及说法,而是重新编纂了南唐的皇室宗谱。这两种取向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南唐皇室宗谱历史记载的复杂性,当多数记载指向一个祖先时,后续的历史记载可能复制此种“正确”的记载。当编纂者意识到所有的历史记载可能是错误的,那么重构记载便是一种尝试。

Alan Cole, 阴谋论的真相:〈坛经〉狡猾叙事中的禅(Conspiracy's Truth: The Zen of Narrative Cunning in the Platform Sutra), Asia Major, Volume 28, part 1, 2015 , pp. 145-175.

本文主要以《六祖坛经》中惠能与神秀的记载入手,试图呈现出这一文本对惠能、神秀形象构造的方

式，并揭示此种叙事中相关内容构造背后的隐秘动机。

有关惠能从童年到禅宗大师的历史，如果将《坛经》记载和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坛经》有关惠能的叙事，存在诸多虚构之处：他并非出身贫民，而可能是官宦之家；并非出身岭南本地，而是来自湖北；并非一字不识，而是有一定的文学修养。通过对比神秀与惠能在赋诗竞赛中表现，则蕴含了更为深刻的内容：神秀在五祖弘忍选拔继任者的处境中进退两难，他的做法也是首鼠两端；而惠能普通的外表、卑微的出身，却暗示了他的单纯无辜；神秀与惠能的诗作比较，更突显了惠能的聪慧与佛性。通过这种比较将惠能与神秀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并赋予神秀狡猾的两面派角色，从而凸显惠能的高贵品质。此种取向故意忽略了神秀和惠能所在的佛门等级，而是以道德评价做出的判断。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文本的作者试图通过惠能所期望的内容来构建整个叙事，但更受益于其所设定的神秀诡计多端的形象。

通过《坛经》对惠能成为禅宗六祖故事的梳理，其叙事方式有两点十分值得关注：一是惠能成为禅宗六祖的方式，《坛经》以私密化的方式呈现了惠能成为禅宗六祖这一公共议题，从而使故事变得更加立体和可信；二是新的叙事形式如何胜过了旧的模式。在《坛经》的叙事中，一个重要的方式是构造了人物的对立面，通过这种方式使人物形象更为丰富，同时作者在叙述惠能聪慧的同时，又将其置于佛教传统的谱系当中，使“目不识丁”的惠能能沐浴佛光，从而为他后来的成长做好了铺垫。

三浦秀一，湛若水“二业合一”论及其思想史的位置
(湛若水「二業合一」論とその思想史の位置),《集刊東洋學》第112号,2015年1月。

程朱理学的观念是修己与治人两者的并存，因此，考生们通过科举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与程朱理学的理想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北宋以来，关于举业与学问的关系问题就一直被重视。程颐认为只要坚守对圣学的志向，那么限制好举业的学习时间就不会受到不良影响。朱熹则认为，读圣贤书的人可以将利害得失置之度外，因此科举对这些人来说并无妨害，即便

孔子复生，在当世也得参加科举。饶鲁则认为义理与举业初无相妨，并进而认为“举业之文未有不自义理中出者”。以上这些观点通过《近思录》、《朱子语类》、《性理大全书》等书籍传递给了后世举子。到了明代正德末年，湛若水(1466—1560)提出了更加肯定考生现实的“二业合一”主张，该主张不仅获得了众多支持者，也引发了对其可行性的讨论。本文考察了湛若水“二业合一”论的立论意图、产生背景、后世的不同反应及其理论发展方向。

对“天理”进行“随时随机”的体认是“二业合一”论的思想前提(湛若水《答蔡元卿》)，这是受到了程颢、李侗和其师陈献章的影响，将举业视作“日用”。胡居仁与陈献章、湛若水与王守仁分别对于“体用一源”说的讨论是“二业合一”论的产生背景。嘉靖初年，湛若水复官，在讲学活动中以“心事”、“体用”合二论为中心。嘉靖四年冬，他的讲学记录以《雍语》为名出版，其中有《二业合一训》。五年秋，又刊行了《泉翁二业合一训》。对湛若水来说，“二业合一”论是其“合一”论整体中的一部分，并且，他的弟子们也将“合一”论视作湛若水思想的核心，这样的观点随着湛若水的门生和故交赴任各地而传播开来。对于“二业合一”论的讨论，既有反对将举业抬高到与德业并列的观点，也有认为举业只是各种事业之一不应被特意标出的观点。季本(1485—1563)《说理会编》认为，事业虽然有职种之别大小之分，但用来修德就是同样的“德业”，用来“谋食”就是“举业”。另外，唐顺之提出了“心艺相即”的观点，蒋信(1483—1559)提出了“镜鉴”的观点，胡直(1517—1578)提出了“本末相即”的观点，这些都是在“二业合一”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修改。

到了万历后期，冯从吾(1556—1627)认为，理学和举业原是一事，通过亲身体验举业所得的知识才是真理学，通过文章来发挥理学真理才是好举业。冯氏的友人、东林党人高攀龙(1562—1626)认为，“吾性无外”，举业只是“吾性”之一。这些观点则是试图挽回“德业”的“物化”倾向而做的努力。

岡部毅史，西晋皇太弟制度初探(西晉皇太弟初探)，
东方学129号,2015年1月,页32—48。



所谓皇太弟制度，即与皇太子制度相应，是指以皇帝胞弟为帝位继承者的制度。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关于皇太子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相较之下，以“皇太弟”切入帝位继承制度或政治史的研究却比较有限。据史料记载，皇太弟制度首次出现于西晋惠帝时期，那么，一般情况下理应由嫡子或嫡孙继承皇位的帝位制度，为何会在这一时期发生突转？本文即以皇太弟制度首次出现的西晋时代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其出现的背景及过程，探讨中国帝制制度史上皇太弟称号出现的意义。

西晋时期的皇太弟共有两例，且都出现于惠帝时期，一为武帝第十九子成都王司马颖，一为武帝第二十五子豫章王司马炽。惠帝本已立子司马橘为太子，后因宫廷政变废其位，又册立橘之子为皇太孙，岂料皇太孙很快夭折。惠帝在子孙皆已逝世的情况下，改立外甥清河王覃为太子。两年后，太子覃被成都王司马颖废位。这时河间王颙上表支持立成都王颖，于是颖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太弟。然而，颖在位不足半年便被废位，之后改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由上述皇太弟的废立经纬可见，都与河间王颙有血缘关系且能得到其上表支持有关。但是，对皇太弟继位的正统性不乏怀疑批判者，因为按当时的礼制观念来说，嫡子以外的继承人应当是皇帝兄弟之子，而不是兄弟本人，更何况就惠帝的实际情况来看，有几位侄子还是相当合适的人选。然而由于当时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优势者抛却礼法的任意行为，终于在惠帝期出现了两位合法继承皇位的皇太弟。那么，这种前所未有的帝位制度为何会在这一时期出现？关于这点，不妨以当时的爵位继承制为线索来考察。

据前学研究，两汉时期只能由嫡子继承爵位，这一制度在曹魏以后逐渐松弛，出现了由孙或侄等人继承的情况。至两晋时期，则形成了嫡子嫡孙优先、侄或外侄次之、最后由兄弟继承这样的顺序。事实上，两晋时期弟继承兄长爵位者并不在少数，这种社会风潮可能也影响了皇太弟制度的出现。另外，曹魏末期发生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之间的继承情况，也为西晋时期皇太弟制度的成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这种帝位制度虽然于礼法不合，却并不与当时的社会风潮相违。

总之，西晋时期皇太弟制度的出现，虽说是受中国古代汉王朝嫡系继承传统中兄弟关系同等化这一社会变化的影响，但它毕竟是在司马氏兄弟之间继承爵位这一先例、以及惠帝时期这一特殊的政治情况才出现的临时称号，所以诸如“西晋武帝主动设置皇太弟制度”这种说法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渡边将智，东汉时期近臣的重组（後漢における側近官の再編），东方学 130 号，2015 年 7 月，页 19—35。

本稿所谓的“近臣”，顾名思义是指那些与皇帝关系极为亲近，并能对中央政府的决策造成直接影响的官吏。西岛定生认为，古代中国皇帝统治的本质不在于皇帝个人的力量，而是靠内含秩序的“体制”来维持。受这一观点影响，近年来汉代史研究领域开始倾向于通过西汉武帝之后皇帝和官僚体系的关系，来研究由“个人”统治到“体制”统治这一质的变化过程。但是，皇帝统治的根基无疑是靠官僚制度实现的，因此唯有理清当时中央官制的结构和特征，才能真正理解汉朝的皇帝制度。关于汉代官制的特征，大庭修等认为其核心是九卿机构的统属关系和职责的“重复”，但历代中国又经常进行官制改革，那么新旧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看待？作者曾经提出过这样一种假说，东汉时期一般将政策形成和文书传达两项工作，交付于禁中外部诸官分管。为了更进一步验证这种假说的妥当性，就需要对近臣体制进行分析。既往研究对西汉时期近臣关注较多，但在西汉至东汉的转换期内，近臣的职能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这种情况目前几乎没有人专门研究。

西汉时期负责顾问应对的是内朝官，而到东汉时期则由侍中、中常侍、大夫、议郎来负责。东汉洛阳城的南北宫均有前殿和禁中，前者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所，后者为皇帝的生活空间。大夫、议郎能够进到前殿参与议政，侍中、中常侍则在禁中宿卫。皇帝询问近臣的主要内容是特定案件或时局、政情等，这些内容是由四种近臣共同负责的。这四种官职中，除了中常侍在和帝时期以后变成宦官专任之官以外，侍中、大夫、议郎其他三种在东汉一代一直是由士人担任。关于这三种官职之间的关系，据《后汉书》李固传和儒林传的

记载,可知东汉时期侍中的地位比大夫、议郎更多地受到重视。另外,如果关注当时官吏的升迁情况,则会发现当时有将大夫、议郎中出类拔萃者选拔为侍中的惯例。

据前人研究,西汉在武帝时期以后,担任九卿、大夫、中郎将、郎官等官职者,一般要被赋予内朝官的名号后,才能宿卫禁中或顾问应对。换言之,西汉时期近臣的特征在于平时作为官僚有禁中外面的本职,同时要兼任禁中内部、顾问应对的职责。与此不同,东汉时期的近臣皆为专任前殿或禁中的顾问应对工作,那种禁中内外皆要兼顾的情况已消失。

据《续汉书》序载两汉时期官职体制的变迁可知,光武帝时曾“并官省职”。根据川合安的理解,其含义

不仅是指官职的合并和节省,还包括通过改变中央官僚体系,使诸官之间的职责更加明确化、有效化这层意义。因此,光武帝时期官职改变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对西汉时期近臣与其他官吏之间的模糊边界进行了调整。

综上所述,两汉之际对中央官制的统属关系和职责的“重复”进行了修正,因此东汉时期近臣以外的官僚不再兼任禁中顾问应对的职责。这种近臣机构的重组,有可能正是汉朝统治从“个人”向“体制”转变的契机。

(朱文哲、陈磊、郭雪妮 摘译)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2016 年“亚洲宗教、 艺术与历史研究”博士、硕士招生简章

一、项目介绍

“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是由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批准、文史研究院主持，并得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支持的硕士、博士招生项目。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亚洲”或者“东亚”的研究逐渐发展，许多著名大学越来越趋向不再区分中国研究、朝鲜研究、日本研究、伊朗研究或印度研究，而是进行交叉的或综合的“东亚”或“亚洲”研究，同时，原来严格的学科界限，如历史、文学、哲学也在逐渐淡化，传统的“中国研究”也由于“从周边看中国”的理念而研究视野被扩大。因此，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支持下，于 2011 年起，开设“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博士方向，这将是一个综合性的、贯通古今与中外、具有前瞻意味的博士培养计划；并于 2013 年起，招收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以培养专业基础更扎实的、连贯性较强的亚洲研究方向的学生。这一项目将兼收国外与国

内的学生（国外研究生需要首先通过汉语等级考试），培养具有对亚洲历史与文化有综合知识，可以从事多方面亚洲研究的人才。并且逐渐使研究生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较好的语言和文献能力，明确的问题意识，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宗教、艺术和历史有较专门的知识。

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不仅拥有多名可以用中英文双语教学，研究范围自西亚、中亚、印度到中国、韩国和日本，研究领域从艺术、宗教到历史的学者，并且将会有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参与教学。本项目的基本课程，将包括“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亚洲物质文化与艺术史”、“亚洲诸国的历史、宗教与思想”以及“有关亚洲的文献概述”、“国外亚洲与中国学的研究”等。

二、导师介绍

目前，“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博士方向有

导师四人，分别为：葛兆光教授、杨志刚教授、李星明研究员、董少新研究员。

葛兆光，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现任文史研究院教授、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著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等，论著曾译成多种外文，并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第一届长江读书奖、第三届与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

杨志刚，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博士，现为上海博物馆馆长、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礼学和礼仪制度史，文化遗产和博物馆文化研究等。出版《中国礼仪制度研究》等个人著作多种，校点《东塾读书记》。目前正在推进“孔庙历史与遗产”研究。兼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当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等学术工作。多次获教学成果奖，被评为复旦大学本科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等。

李星明，东南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美术史及美术考古。目前主持8卷本《中国陵墓雕塑全集》（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组成部分）的编撰工作，该全集正在陆续出版；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规划基金项目《隋唐墓俑艺术研究》。专著《唐代墓室壁画研究》2007年入选中国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2009年获第五届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二等奖。主编《中国陵墓雕塑全集·4·两晋南北朝》2008年获第二届中华优秀读物图书提名奖。

董少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外关系史、中国天主教史、明清史、东亚海域史、科技史等。著有《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朝天记——重走利玛窦之路》（合著）等；译

著《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编著《西文文献中的中国》；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约50篇。曾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2011年）、上海市社科新人奖（2012年）、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3年）等。

“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导师包括文史研究院刘震研究员，许全胜、孙英刚、朱溢、邓菲、白若思、朱莉丽、张佳等副研究员。

刘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甘地和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藏学系博士，掌握梵语、藏语、巴利语等多种专业外语。研究领域为印度大小乘佛教，印、藏、汉佛教文献比较以及梵语写本，吠陀文学和吠陀宗教。著有《禅定与苦修——关于佛陀传原初梵本的发现与研究》、《〈赞法界颂〉校勘》及20余篇论文。

许全胜，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史与近现代学术文化研究，著有《沈曾植年谱长编》、《黑鞑事略校注》，合编有《沧趣楼诗文集》、《上海图书馆藏善本碑帖》、《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等。

孙英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访问学者，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国际佛教大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访问研究学者。研究领域涵盖术数学与中古政治，佛教史，作为信仰空间的长安，以及国外汉学及史学理论，著有《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隋唐五代史》，主编《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主持国家社科和教育部项目若干，发表论文60余篇。

朱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从事唐宋史、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和礼学思想的研究。著有《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以及论文二十余篇，包括《论唐代的山川封爵现象——兼论唐代的官方山川崇拜》、《唐至北宋时期的大祀、中祀和



小祀》、《从郊丘之争到天地分合之争—唐至北宋时期郊祀主神位的变化》、《唐宋时期太庙庙数的变迁》、《唐至北宋时期太庙祭祀中私家因素的成长》、《唐至北宋时期的太庙禘祫礼仪》等。

邓菲,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系博士。主要从事宋元美术考古与物质文化研究。研究兴趣包括:图像、空间与丧葬文化、视觉艺术中的复古维新、物质文化资料所体现的文化互动等。发表中英论文十余篇,包括《“香积厨”与“茶酒位”——谈宋金元砖雕壁画墓中的礼仪空间》、《试析宋金时期砖雕壁画墓的营建艺术——从洛阳关林庙宋墓谈起》、《关于宋金墓葬中孝行图的思考》等。承担并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图像、空间与信仰:中原北方地区宋金元砖雕壁画墓研究”与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原北方地区宋金墓葬艺术研究”。

白若思,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人,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学士(2004)、硕士(2006)、副博士(2009),专业为中国语言文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博士(2010)。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说唱文学、中国宗教与社会史(宋至清代)、中俄交往与文化交流史(17世纪至19世纪)。出版俄文专书《小篆字体部首对照表》、《宝卷文献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以〈目莲三世宝卷〉为例》,并发表英文、俄文、中文论文多篇,包括:《〈香山宝卷〉现存最早版本》、《常熟地方神信仰与当地宝卷的关系》。

朱莉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大

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日交流史。目前的研究方向为明清时代的东亚商贸、文化交流以及明清来华外国使节记录中的中国形象。著有《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论文包括《试析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中国观:以〈善邻国宝记〉所收外交文书为中心》、《浅析日本室町时代足利幕府的对明认识及其政策》、《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情报——僧侣、商人与东亚的信息传递》等。

张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2004),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2007),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2011)。主要研究领域为明代社会文化史,目前正在从事元明社会文化转型以及明前期中朝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著有《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发表的论文包括《再叙彝伦:洪武时期的婚丧礼俗整肃》、《别华夷与正名分: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等。

三、报名注意事项

详细招考流程请见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网站:<http://www.gsao.fudan.edu.cn>。申请者在提交书面材料时,请在封面上注明“报考文史研究院‘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项目”。

报名材料寄送地址:200433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联系人:肖军

电话:(86)21-5566 5284

电子邮箱:xjfd@fudan.edu.cn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活动预告

一、第五届 FTP 三校合作国际学术会议

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联合举办的第五届 FTP 三校合作国际学术会议将于 2015 年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18 日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学术会议的主题是“东亚文化交流史中的文学与图像 (Literature and Image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in East Asia)”,会议由议题为“唐五代图像”、“韩国与日本文化”、“佛教、道教图像”、“元代画家与绘画”的四场专题报告、开幕式、闭幕式及户外考察组成,艾尔曼 (Benjamin Elman)、板倉聖哲 (Itakura Masaaki) 等八位学者将作为四个专题讨论的主持人和评议人。来自复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京大学的近 20 位学者将参加此次会议,参会代表及论文如下:

Anna Shields: Visualizing Friendship in Mid-Tang China/中唐时期友谊的视觉化

李星明 (Li Xingming): 唐代山水画的形狀——基于墓葬出土山水图像和传世山水画诗文的观察 / Landscape paintings in the Tang period: Evidence from Archaeology and Literature

Steven Chung: Strange Attractors: Korean Media Cultures from the Postwar through the Present/奇特的吸

引者:战后至现在的韩国传媒文化

Haruko Wakabayashi: From the Land Beyond Seas and Skies: Trans-Boundary Marriages in Medieval Narrative Tales/来自海天之外的世界:中世纪故事中的跨界婚姻

平勢隆郎/Hirase Takao: 関野貞調査と道教の接點/关野贞调查与道教的关联

Rostislav Berezkin/白若思: Images of popular Buddhist narratives at the Ming court: intersections of painting, text, and performance/明朝宫廷中流行佛教故事的图像:绘画、文本和表演的交织

塚本麿充/Tsukamoto Maromitsu: 任仁発と任月山—「琴棋書画図」(东京国立博物館)を中心とした任仁発イメージの変容—/任仁发与任月山——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琴棋书画图》看任仁发形象的转变

板倉聖哲/Itakura Masaaki: 画家像としての夏永、その成立と展開—「岳陽楼図」を中心に/夏永画家形象的形成及发展——以《岳阳楼图》为中心

邓菲 (Dengfei): 元代墓葬中的山水之境/ Landscape paintings in Yuan tombs



二、壁上观——中国壁画·山西篇

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联合举办“壁上观——中国壁画·山西篇”系列活动，该系列文化活动包含专题讲座、文化考察、艺术体验等内容，活动具体安排可以登录上海博物馆官网（www.shanghaimuseum.net）“活动”栏目获取。大量讲座及学术沙龙将在2015年10月至12月举行，如下：

图像如何作为历史文献

时间：9月20日 14:00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墓葬与绘画史研究

时间：10月15日 19:00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巫鸿 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

地下的苍穹——山西地区的北朝墓葬

时间：10月31日 14:00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张庆捷 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孝子图里的玄机

时间：11月1日 10:00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杭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丝绸之路与古代山西

时间：11月1日 14:00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张庆捷 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后期文本”与美术史研究

时间：11月7日 14:00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尹吉男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山西北朝壁画

时间：11月29日 14:00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石金鸣 山西博物院院长

另一类美术史

主讲人：李维琨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副主任、研究员

活动时间地点待定

生与死——墓葬壁画中的世界

主讲人：齐东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活动时间地点待定

从山西寺观壁画看跨宗教文化的践行

主讲人：李松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活动时间地点待定

不只是风格史——山西古代墓葬壁画纵横谈

主讲人：郑岩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活动时间地点待定

中原北方地区宋墓所反映的葬俗和社会问题

主讲人：秦大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活动时间地点待定

唐代山水画的形状——基于墓葬出土山水图像和传世山水诗文的观察

主讲人：李星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

活动时间地点待定

山西地区宋代金壁画墓的营建和工艺

主讲人：邓菲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活动时间地点待定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15.07—2015.09)

● 2015年7月1日—8月1日

葛兆光教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巴黎中心参加“中国人文学：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班。

● 2015年7月3日

葛兆光教授在法国里昂参加“人文对话(Dialogues en humanité) 2015”活动。

● 2015年7月5日—8月15日

许全胜副研究员及王鑫磊助理研究员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为期40天的学术访问，并分别作了题为《说蜜》及《东亚视野下对1592年朝鲜战争的思考》的学术报告。

● 2015年7月7日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颜娟英在“复旦文史讲堂”做题为《现代台湾寺庙建筑的新样貌》的学术演讲，李星明研究员主持。

葛兆光教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巴黎中心“中国人

文学：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班做学术报告，题目是《谜一样的古地图》。

● 2015年7月8日—10日

李星明研究员、邓菲副研究员参加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中心访问学者工作坊“话与诗：再论中国山水画与风景的含义”。

● 2015年7月10日

葛兆光教授访问比利时鲁汶大学，看望文史研究院国际评鉴委员钟鸣旦教授和曾为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的戴卡琳教授。

● 2015年7月16日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我院学术委员大木康作为2015年度复旦大学外国高专计划第六次来访。

葛兆光教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巴黎中心“中国人文学：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班演讲，题目是《国语与国家——现代中国建构统一国家语言的困境》。



• 2015年7月21日—8月8日

为配合我院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编著的《支那文化史迹》的项目,我院李星明研究员利用暑期,沿着常盘大定和关野贞20世纪早期的踏查足迹,到河南开封、洛阳和登封以及陕西西安考察北朝、隋唐、宋辽时期的相关遗迹和文物的现存状况,并核查出该套图集中的某些讹误。同时,我院博士生杨洁也对西安碑林博物馆和陕西礼泉县唐昭陵的相关碑刻、造像和建筑的现存状况进行了调查。

• 2015年7月

《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刊发朱溢副研究员的论文《中古中国宾礼的构造及其演进——从〈政和五礼新仪〉的宾礼制定谈起》。

《佛教文化研究》第一辑刊发孙英刚论文《何以认同——昙延(516—588)及其涅槃学僧团》。

《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共五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为我院“从周边看中国”研究方向的成果之一。

刘震研究员编校的《赞法界颂》(Dharmadhātustava)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孙英刚副研究员主编“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第一种(美国斯坦福大学宗教研究系教授柯嘉豪的《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第二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宗教研究系讲座教授柏夷的《道教研究论集》)由中西书局出版,该丛书今后将持续出版,以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 2015年8月8日—8月11日

葛兆光教授赴北京参加教育部高等学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2015年项目评审会。

• 2015年8月10日—15日

朱莉丽副研究员赴台湾大学高等研究院参加“东亚视野中的‘中华’概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交了题为《何处是中华——江户时代日本关于“中华”概念的理论重构》的学术论文。

• 2015年8月13日—20日

上海博物馆馆长、我院院长杨志刚教授及李星明研究员、邓菲副研究员参与了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壁上观:中国壁画·山西篇”展览和系列学术讲座筹备考察活动,从晋南到晋北实地考察了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时期重要的寺观壁画和一些北朝、宋、辽、金、元时期壁画墓。

• 2015年8月15日

董少新研究员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赴美国旧金山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

• 2015年8月16日

葛兆光教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参加《中华文史论丛》上海编委会会议。

• 2015年8月16日—23日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我院学术委员大木康作为2015年度复旦大学外国高专计划第七次来访。

• 2015年8月24日—29日

邓菲副研究员参加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与中研院史语所合办“艺术史中的作品研究”研习营,并担任分组讨论主持人。

• 2015年8月31日

邓菲副研究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作了题为《图像的复古与再造——谈宋金墓葬中的孝子故事图》的学术报告。

• 2015年8月

葛兆光教授的《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一书获第八届“香港书奖”。

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获第三届“思勉原创奖”。

段志强助理研究员著《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



人政治人格的重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为“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之一。

● 2015 年 9 月 1 日

孙英刚副研究员受邀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学者,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我院学术委员大木康作为 2015 年度复旦大学外国高专计划第八次来访,并在上海博物馆作题为《“疑非人间”的风雅空间》的学术报告。

● 2015 年 9 月 7 日

我院召开“《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暨《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新书发布会”。

● 2015 年 9 月 7 日—9 日

李星明研究员参加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 2015 年 9 月 8 日

日本驹泽大学小川隆教授在“复旦文史讲堂”做题为《关于日本的禅宗研究》的学术讲演,由葛兆光教授主持。

● 2015 年 9 月 9 日

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进兴,香

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中文及历史系主任李孝悌与我院葛兆光教授在“复旦文史讲堂”做题为《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趋向》的学术讲座。

● 2015 年 9 月 11 日

我院举行研究生新生见面会,今年共招收 5 名硕士研究生及 5 名博士研究生,同时参加见面会的还有我院各位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生,新生辅导员及高年级的博士及硕士研究生。

● 2015 年 9 月 20 日

葛兆光教授应邀在上海博物馆为“壁上观:中国壁画·山西篇”展览和学术讲座活动做第一场讲座,题目为《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的“内”和“外”》,由杨志刚馆长主持。

我院副研究员朱溢在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参加江浙沪宋史青年学者沙龙,并担任陈文龙论文《五代时期的正统论》的评议人。

● 2015 年 9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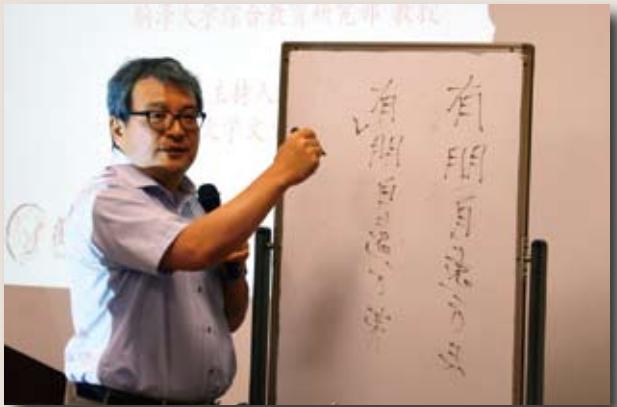
葛兆光教授的新著《交错的东亚宗教》(傅斯年讲座)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出版。

葛兆光教授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获教育部第七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李星明研究员受聘担任文史研究院副院长。



2015年7月7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颜娟英在“复旦文史讲堂”做题为《现代台湾寺庙建筑的新样貌》的学术讲演，李星明研究员主持。



2015年9月8日，日本驹泽大学小川隆教授在“复旦文史讲堂”做题为《关于日本的禅宗研究》的学术讲演，葛兆光教授主持。



2015年9月9日，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进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中文及历史系主任李孝悌与我院葛兆光教授在“复旦文史讲堂”做题为《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趋向》的学术讲座。



封面题字 王元化

封面底图 帛画云气占图（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

编 辑 汤克凤、肖军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200433
电 话 / 传 真 86-21-5566 5284
邮 箱 wsyjy@fudan.edu.cn
网 站 www.iahhs.fudan.edu.cn